

张清常

胡同 及 其 他

社会语言学的探索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胡同及其他

社会语言学的探索

张清常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胡同及其他

张清常 著

*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国防工业出版社排版

兵器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8.125 印张 174 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5619—0102—X/H·75 定价：4.75 元

胡同及其他

内 容 提 要

北京街巷胡同多如牛毛，名称内容丰富，犹如小百科，中外人士对它都感兴趣。各家论述，重在历史地理；街谈巷议，偏爱掌故与民间传说。要把北京街巷胡同名称作为社会语言学来研究，此书是初步探索；因此多半是专题短文，力求务实，力求创新，力求行文不太枯涩。

作者提出胡同是来自蒙语的借词，比较可信，早为有关方面采用。现又查明胡同在全国使用的情况。

通过北京街巷名称去观察旧北京面貌，不仅是社会语言学的探索，也是爱国主义的生动内容，发人深省。

此书或可供关心北京的读者披阅，供研究北京的学者参考。

自序

这本小册子是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于北京城区街巷名称进行表面的观察,既不深入,也够不上研究的水平。如果说它是中国自己在社会语言学方面的初步尝试,提出一些零星资料,有时附上一些肤浅的想法,给专家学者做参考用,这倒还勉强够得上。并不是说这些零星资料是独得之秘,肤浅的想法更不是石破天惊的高论,只不过由于路是人走出来的,这条新路是以语言为中心,综合社会、历史、地理、文化等等方面,以北京街巷名称为剖析的聚光焦点,做做试试看。

因此,这本小册子能有八仙巷、李铁拐斜街、吕公(洞宾)堂……,却没有美妙动人的民间故事传说等等。

生长在北京,街巷名称很容易引起我的浓厚兴趣。刘海儿胡同,对于七八十年前的幼儿来说,一提就想到刘海儿戏金蟾,孩子们的兴趣,不下于各位之于阿托木。路过二郎庙,就替孙悟空捏一把汗。尽管我支持孙猴儿,可是齐天大圣都斗不过杨戬,我更不行啦。有志不在年高,我非勤学苦练,学会绝招儿不可……。十五岁学会骑自行车,那劲头儿赛过今日有辆“轻骑”亚马哈。大街小巷,东口儿进,西口儿出,明知是口袋胡同、罗圈儿胡同、闷葫芦罐儿、磨盘院儿,非去转转不可。有几个耳朵眼儿、核桃瓢

儿？钻进去看看。

北京街巷名称好象精致的艺术品，三五个字，要跟齐白石以水墨画虾米、蝌蚪、小雏鸡儿……一样地具有语言艺术水平，才能制出这些跟艺术珍品一样街巷名称。

我有位小学老师姓程、讳振山、号恢仁，他是我铭记不忘的楷模，他的家在东直门顺城墙往南走，与东颂年胡同东口正对着，与蚂螂胡同平行的那条胡同：山子石儿（假山、太湖石）后身儿。我看望他，那里只有高耸的城墙，并没有山子石儿。可是这条街巷名称创造了气氛，使人感到真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心情。

我对于北京街巷名称，由喜爱而欣赏，发展到也要问个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儿。要回答这类问题可不简单。

人们说北京的胡同多如牛毛，这话有诗意，不可当真。又说北京街巷名称象一本小百科词典，这话有实意，不可以小看了它。

我作为业余爱好，徘徊于北京街巷名称之中，偶尔以游戏笔墨，写写心得，不是回答问题，乃是提出问题，向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请教。因为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例如：当初怎么解释“胡同”这两个字，曾是个难题，现在，许多论著，如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史》编写组的《北京史》（北京出版社，1985年，已有日文译本）已经采用了胡同“是蒙古语‘水井’之义”（见105页），电影《老北京的传说》也采用这一说法。看来大家又要求前进继续攻克新的难题了。这本小册子只是在开始探索道路吧。

关于北京史、北京街巷以及其他方面，我读的书籍专著论文很少很少，因为我对这些方面是业余爱好者。我很感谢曾经在这

方面作出贡献的古今专家学者们。他们的著述的份量如此之多，以至于被收进王灿炽编的《北京史记风物书录》(北京出版社，1985年)的专著论文题目的篇幅竟达59万字之多，无法一一向作者致意了。其中已列、未列的，例如新版的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的《北京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明清北京城图》(地图出版社，1986年)等等更是使我受到不少教益。至于各种版本的北京街巷名称录，各种版本的大大小小地图，方便了广大群众，我也受惠不浅。

我要感谢我的蒙语老师清格尔泰教授、陈乃雄教授、照那斯图先生和随时帮我解答我的疑问的许多位在内蒙古大学工作的蒙汉朋友。清格尔泰在给我讲解蒙语四个后高元音的时候，边发音边替我在我的《美术日记》本上画音标，手迹犹存，令人信服。如果没有他这一课，我就难以跟日本多田贞一先生讨论了。陈乃雄教授的教诲，令我难忘，可惜我没有学好，辜负了他讲的那一年课，十分羞愧。1985年5月3日承他为了解答我的疑问，写了长长的一封回信，使我不但受益，而且开拓了视野。最近为了解决我的疑问：为什么今天呼和浩特没有胡同，我惊动内蒙许多相识与不识的朋友，他们的帮助，我十分感谢。

我还要感谢各个方面支持我的新老朋友们，或帮我找资料，或回答我的大大小小的问题。不能一一提到了。

我近十年来在北京语言学院受到上下各方面的关心和帮助，这次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大力出版这本杂书，我十分感谢！

很抱歉，我没有能在这次为读者提供一个资料性的附录。岁月蹉跎，成就能得几许？沧海一粟，修订有待来年。

刚解放，我在当时位于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路北的北

胡同及其他

师大文学院兼课。在教员休息室，就跟刘盼遂、陆宗达两位先生谈文字音韵训诂，在学生宿舍，就跟曹尔驷同学聊北京胡同。以此因缘，大约是在 1978 或 1979 年，老曹还特意到天津南开大学找我继续聊。若干年后，偶然在《北京晚报》之《五色土》副刊(?)看到一篇文章提到老曹已经作古，曷胜痛悼。

1982 年 7 月，老伴儿开始卧床，病情时好时坏，这时才得朝夕相伴，生死与共。三年之中，为了解除病人烦恼，聊这聊那，胡同也是两口子谈起来眉飞色舞的话题。大限已到，先我而解脱。每一涉及街巷胡同，追念逝者，更增惆怅！

社会语言学的每一个课题，都是艰难的，北京街巷名称虽是微乎其微的对象，也不是像局外人所想的那么简单。敬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张清常
1990 年春

目录

自序

明清以来北京城区街巷名称变革所涉及的一些语言问题	(1)
胡同与水井	(16)
附录：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	
衡字晚出说	(33)
明朝的胡同	(39)
释胡同	(57)
再说胡同	(68)
北京街巷名称的语言问题琐记	(86)
北京街巷名称所反映的北京旧貌	(93)
一、汉语的街巷名称用字和“胡同”的出现	(95)
二、从北京街巷名称看居民的来源	(111)
三、从北京街巷名称看北京地理的一些情况	(123)
四、从北京街巷名称看北京街巷交错的局面	(140)
五、从北京街巷名称看封建社会畜牧业的一些情况	
.....	(150)
六、从北京街巷名称看早期手工业的遗迹	(163)

胡同及其他

七、从北京街巷名称看旧时物资交流市场贸易的遗迹……	(167)
八、从北京街巷名称看封建社会平民百姓及其职业的一些情况……	(183)
九、从北京街巷名称看封建社会官府衙门等的遗迹……	(192)
十、从北京街巷名称看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府第和驻军营卫的遗迹……	(198)
十一、从北京街巷名称看过去宗教建筑情况 ……	(206)
附录……	(226)

明清以来北京城区街巷名称变革 所涉及的一些语言问题

摘要 北京城区街道名称反映出它在语言方面的一些问题。在语音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有时有的地名变革造成口语上的叫法跟书面上的念法不一致。在词汇方面,从北京城区街道名称的变革也可以看到,如果采用保留原名的办法,也会在词语方面出现一些特殊现象。有的地名由于时过境迁,后来记音乖讹,似是而非。有的地名由于后来感到原名“文不雅驯”,因而在原名的语音基础上,采取谐音的办法改换字面,既与原名音同音近,不耽误寻找原来地方,又产生了新意。这种改动是地名变革中所特有的,不烦另起炉灶,因而也是群众最容易掌握的。

由于文献材料不足,北京城区^①街道名称可知其为辽金及以前时代已有而且原名至今未改的,并不太多。确知其为元朝已有而且原名至今未改的,也很有限,像“砖塔儿胡同”^②“刘蓝塑胡同”^③这些就算比较少见的了。元朝“大都”的南线城墙有个“海岱门”(这个名字一直到清末义和团时期的档案和笔记里还在用),后来老百姓俗称为“哈德门”,^④哈德在这里按北京口语念是 hǎ · da,就是哈达。(也有过献哈达从此门入的传说,流传虽广,恐不可信。据清朝乾隆时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五城市引元末熊梦祥《析津志》云:“文明门,即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此说当是。)北京城区地名像这样保留蒙古语译音如“哈德门”“褡裢坑”“褡裢胡同”的颇为罕见。

明清两代关于北京城内地名情况的文献材料就比较丰富一些,能使我们知道北京城区地名的全貌,例如有明朝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以及地方志、笔记等一些资料,还有地图《明京师图》《乾隆京城全图》等。民国时期也有北京城区比较详细的地图和其他资料如民国五年(1916年)编印的《京城地名表》等可供参考。解放以后,北京史的研究受到重视,有关北京历史的文献有的也陆续重新整理刊印。

关于地名的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它涉及许多学科若干方面。作者这篇短文只局限于讨论明清以来北京城区街道名称所涉及的一些在语言方面的问题,着重于语言现象的分析而不考证地名的历史等等。

北京城区街道名称所反映的语音现象大致有下列两个方面,共五种情况。其中有一些交错兼跨。大致说来,第一个方面是地名的念法反映出北京语音的本身特点,下述五种情况中的

一、二、三属于这类。第二个方面是地名变革造成口语跟书写形式不一致，下述五种情况中的四、五属于这类。

一、保留了北京话里这个词语的特殊念法。例如：“排子胡同”“牛排子胡同”^⑤它们的念法须与排子车的“排”pǎi 一致，不能念成排球、排骨、牛排、猪排的“排”pái。念 pǎi 的要加“子”，念 pái 的不能加“子”。

二、保留了早期的北京音。例如：在南锣鼓巷有个“何纸祃胡同”，当初命名可能源于那时有个姓何的住在那里，他擅长经营封建迷信用具纸祃。后来这地名却被写成“黑芝麻胡同”。胡同的名字完全改了，字音当然也改了，这另当别论。但在今天，当地人把这条胡同的“黑”仍然念“何”或“贺”，这却保留了古入声字“黑”在早期北京音里不知哪一种口音的念法。而且那时必须是“黑”与“何”同音，因此才能够以“黑”代“何”。

三、为了区别相同的地名而在语音上略有变化。例如：原来北京有两个地名都是“大栅栏”。^⑥为了区别它，北京人把前门大街西侧的叫做 dà · shilàr，“栅”念成轻声的 shi，“栏”则儿化却重读；把西长安街北侧的叫做 dàzhà · lar，“栅”念重读的 zhà，“栏”虽也是儿化却念轻声。自从本世纪五十年代末为了展宽西长安街拆除了这一处，此后只剩下前门大街那一处。外地人对于为什么要把前门大街“大栅栏”的音念得那么奇特就往往难于理解。

“栅”本是古入声及去声字。在《广韵》入声二十陌韵测戟切，入声二十一麦韵楚革切，均属初母入声韵。还有一读是去声三十諫韵所晏切，属山母阳声韵。三读的意思都是“竖编木”“篱栅”“村栅”等。北京话的“栅”念 zhà 是属于古入声消失后形成的阴声韵。但北京话把“栅”念成前门大街大栅栏 dà · shilàr 的轻声

shi,似乎来源也很早,当初或许念 shā,并非轻声。明朝“大明沟”的旧称“北沟沿儿”(后改名赵登禹路,曾改名为白塔寺东街)西侧有个明朝时叫做“栅栏胡同”的,清朝叫做“沙腊胡同”,现代叫做“后纱络胡同”。牛街东侧有个“沙栏胡同”,可能当初也是“栅栏胡同”吧。这些材料证明“栅”在北京话里很早就念“沙”。

四、为了区别相同的地名,把某些地名改写为跟原名的声音相同或相近似的字,一般叫它“谐音”法。但是实际上在年龄较大的土著居民口中,把改后的新名仍按原名来念。例如北京原有八个“罗圈儿胡同”,^⑦后来把在府右街的改为“罗贤胡同”,把在辟才胡同的改为“乐全胡同”。这是打算从文字上加以区别,也希望人们此后就按改写的念,显出区别来。可是不少的人尽管书写地名时写成罗贤、乐全,口头上仍然念成罗圈儿。这种不一致还将存留一段时期。

五、因为口语中的原来地名被认做“文不雅驯”,于是在书写上改成谐音的文雅字眼儿。可是口语中仍然保留了原来的念法。例如北京把用刀斧砍好了便于引火的小块木柴叫做劈柴 pǐchái, pǐ · chái。西单北大街西侧有个“劈柴胡同”。名称行用数百年,成了积习难改。1905年书面上改为“辟才胡同”,以示开辟学校,教育人才之意。^⑧尽管辟念 pì,才念 cái,“辟才胡同”仍然念做“劈柴胡同”。地名书写至今已改了八十年,但仍改不动口语上原地名的念法。

以上两个方面五种情况是北京城区街巷名称所反映的语音现象。不但有一些情况相互错综,而且第四第五也只是不同原因所产生的同一结果。可是真正具有特点的,恰恰就是第四第五。它反映出只有在地名变革时才特有的语音现象。即只有在这种

特殊情况下才会产生的口语跟书写不一致。这乃是临时性的。产生这种特殊情况只是由于书写要改成与原来地名谐音(声音相同或近似)的其他字眼，而口语不曾改，因此脱节不一致。罗贤、乐全、辟才这些字在其他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念成罗圈儿、劈柴的。

在早期，地名主要是口耳相传，地名的念法当然与口语完全一致。随着交际频繁，书信往来，街巷名称要写成文字。市政管理日益加强，邮政事业发达，要求街巷名称都必须以文字形式固定下来，便于管理整顿，以免混乱。这时，文字形式由于种种原因，未必能够尽与口语原名一致，有时还会有所改动。不论如何，在这以后，街巷名称的名牌和各家户门牌上的写法，自然就要成为标准，要求人们都要照这样写，也照这样念。如果它与地名原来的口语念法不一致，它就会逐渐地、或迟或早地、终于代替了原来口语的念法。

有变得快的。例如北京城区街巷以“达子”为地名的，原来有“达子营”四个，“达子府花园”“达子庙”“达子桥”各一，“骚达子胡同”两个等。这是民族歧视的遗迹。有的已经废除，有的改为“达智”。在“子”“智”音近的方便条件下，既除旧迹，又具有新义。尽管北京音区分 z 和 zh 很严格，“子”“智”的念法区分得很清楚，可是居民欢迎这一改变，很快就把“达智”使用开了。又如“苦水井”的苦水没有了，改为“福绥境”，就没有什么人坚持保留旧名旧音。

也有犯众怒而改不动的。例如，旧社会北京城区街巷名称有三处“鬼门关”，北洋政府曾改为谐音的“贵人关”，老百姓却仍然叫它“鬼门关”，直到解放之后取消了这个地名。

在词汇方面,从北京城区街巷名称的变革,也可以看到词语方面一些特殊现象。

这里所说的变革,不包括那些新名与旧名,并无因缘毫不相干的。例如早年本名为“许游击胡同”,后来叫做“西方庵”,又改名“松鹤庵”,今改名为“松鹤胡同”。既然几个名字彼此“风马牛不相及”,也就没有什么规律可寻。

有的地名变革是由于后来记音乖讹。当初命名原来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口耳相传,年深日久,后来的人已经不知道它取名字时的原由了,因而产生讹变。写成文字之后,反倒成为似是而非,甚至成为不可理解的地名了。例如德胜门内大街西侧有个“三保老爷胡同”,命名由于明朝三保太监郑和。后来叫成了“三伯老胡同”,以后又叫成“三不老胡同”,沿袭至今。又如现在崇文门内大街西侧,在北京站西街附近有个“治国胡同”,以前叫做“尧治国胡同”。其实它与尧舜治理国家无关。它在数百年前原是有个姓姚的铸锅匠住在那里,那条胡同本名是“姚铸锅胡同”。又如复兴门内大街北侧,北闹市口附近有“大沙果胡同”“小沙果胡同”。其实它与水果无关。很早的时候它叫“砂锅琉璃胡同”。容易破碎的砂锅怎么会跟坚固的琉璃弄到一起呢?原来它的本名乃是“砂锅刘胡同”,那时由于当时那条胡同住着一个经营砂锅的刘某而命名的。这种讹变,有时弄得不如索性另外起个新名字。例如东单北大街东侧原有个“吴良大人胡同”,吴良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一,见《明史》卷130。后来的人不知道吴良,地名就变成“无量大人胡同”。“大人”应该是“宰相肚里能撑船”,而竟小肚鸡肠坑害老百姓,是个无度量的大人。这个讹称很有风趣。今改名“红星胡同”。

地名因为经常使用，所以常被简省。这里就不谈它了。

不过如果简省得过分，就会使人不知所云。例如前海之西有明代开国元勋定国公徐达的府第，这条街名为定国公府大街。简省为定府大街，人们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因而称为定阜大街，现名为定阜街。

地名的改变，有许多是由于后来的人对它不喜欢，嫌弃它，甚至忌讳它。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城区街巷名称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绝大多数是老百姓自己给取的名字，约定俗成，口耳相传，积习难改。一旦要大改特改，太不方便，也不容易为群众所接受。于是往往采取一种特殊办法，即使用谐音的办法，选取跟原地名音同或音近的字替代，使它别具新意。改得好的，面目焕然一新，念出来跟原地名的声音差不多，不耽误人寻找原来地方。改得差的，似可解不可解，但终归是换了字眼，减少了原地名不让人喜欢的成分。上文提到的达子改达智，罗圈儿改罗贤，乐全，劈柴改辟才，鬼门改贵人，苦水井改福绥境等例，就是这样做的。

由于这种改动是地名变革所特有的，所以再补充一些例子：

原 名	所 在 地	改 名	附 注
哑巴胡同	朝阳门南小街	大、小雅宝胡同	今通往日坛公园的大街也取名雅宝路。
罗锅巷	鼓楼东大街	南、北锣鼓巷	罗锅儿即驼背。